

[第二版]

■ 一片土地、两个民族

现代巴勒斯坦史

「以色列」艾兰·佩普

— 著

王健 秦颖 罗锐

— 译

A History of Modern Palestine:



One
Land,

Two
Peoples

| second edition |

“新历史学家”的旗手、乔姆斯基的同道中人
爱德华·萨义德之后的著名巴勒斯坦史学家

Ilan Pappé

从两个民族共存的角度，讲述这片多难土地的现代历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片土地、两个民族

现代巴勒斯坦史

[第二版]



[以色列] 艾兰·佩普 著

王健 秦颖 罗锐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巴勒斯坦史:一片土地,两个民族:第二版/
(以)艾兰·佩普著;王健,秦颖,罗锐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书名原文:A History of Modern Palestine
ISBN 978-7-208-15277-9

I. ①现… II. ①艾… ②王… ③秦… ④罗… III.
①巴勒斯坦-历史 IV. ①K3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05984号

责任编辑 赵伟

封面设计 林林

现代巴勒斯坦史(第二版)

——一片土地,两个民族

[以色列]艾兰·佩普 著

王健 秦颖 罗锐 译

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5.5
插页 5
字数 337,000
版次 2019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5277-9/K·2759
定价 68.00元

艾兰·佩普 Ilan Pappé

以色列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1978年毕业于希伯来大学，1984年获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英国埃克塞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xeter）社会科学和国际研究学院教授、欧洲巴勒斯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20世纪民族政治研究。其著作有：《现代巴勒斯坦史》《现代中东》《以色列的理念：一部知识与权力的历史》《以色列神话》《论巴勒斯坦》（与乔姆斯基合著）等。

译者简介

王健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重点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东和犹太（以色列）问题、中外关系和中国外交等。

译者序

艾兰·佩普与以色列“新历史学家”学派

—

本书作者艾兰·佩普（Ilan Pappé）在以色列是位争议颇大的犹太历史学家，属于“新历史学家”学派（New Historians）的极左翼，后因公开号召对以色列学术界进行抵制而遭到国内右翼势力的威胁，并最终被迫辞去海法大学的教职，背井离乡到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担任历史学教授。

艾兰·佩普 1954 年出生于海法一个犹太家庭，其父母于 20 世纪 30 年代逃离纳粹迫害来到巴勒斯坦定居。他 18 岁加入了以色列国防军，1973 年赎罪日战争时正在戈兰高地服役。退役后，他于 1978 年毕业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1984 年获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导师为阿拉伯历史学家艾伯特·豪瑞理（Albert Hourani）和罗杰·欧文（Roger Owen）。博士毕业论文后经修改出版，成为其第一部学术专著《英国和阿以冲突》。1984—2007 年，他任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高级讲师，同时兼任海法埃米尔·多马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研究所所长（2000—2008 年）。

从 1970 年底开始，以色列国内长期占据绝对主导的锡安

主义*意识形态因民众，特别是知识界对中东战争的反思而受到后锡安主义思潮的挑战。这种思潮在史学界、社会学界甚至诗歌、小说、电影、戏剧等艺术领域都有表现，其中，艾兰·佩普与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艾米·斯拉姆（Avi Shlaim）、汤姆·塞格夫（Tom Segev）、希勒·柯亨（Hillel Cohen）**等一批犹太历史学家形成了“新历史学家”学派，成为后锡安主义在史学界中的代表性人物，而且以更为激进的论述成为其中的极左翼代表。他根据当时逐渐开始解密的英国和以色列政府相关文件，对1948年以色列产生及同年70万巴勒斯坦人被驱逐或逃离等历史进行了修正性的重新编纂，出版了许多专著，如《巴勒斯坦种族清洗》《阿以冲突的形成：1947—1951》《现代中东》《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等，其中包括笔者翻译的这本《现代巴勒斯坦史》。

艾兰·佩普不仅在学术上主张要客观公正地阐释巴勒斯坦历史中阿拉伯人群体的历史情景，如认为驱逐并不如其他历史学家所言是由于当时的特定环境，而是根据1947年由以色列未来领导人制定的所谓D计划组织的种族清洗，而且他还是

* 锡安主义（Zionism）一词原来中文中大多翻译为“犹太复国主义”，但这一译法只强调了“复国”这一方面，而没有反映出这个词的核心含义——“民族复兴”，因此本书中还是按其原意译为“锡安主义”。关于这个词的翻译问题，我国著名犹太学专家潘光教授在《犹太民族复兴之路》一书前言中有精辟论述：“就像一些外国人将我们的‘井冈山道路’译成‘武装斗争道路’，‘延安精神’译为‘艰苦奋斗精神’，实际上并没有全面理解这些词的本意，不如在翻译中保留原汁原味更好。”（潘光、余建华、王健：《犹太民族复兴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 本尼·莫里斯系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中东研究系教授，艾米·斯拉姆系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汤姆·塞格夫系以色列历史学家、作者和记者，希勒·柯亨系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杜鲁门和平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一个行动主义者。1999年，佩普作为极左翼以以色列共产党为主的哈达什阵线代表参加了克奈塞特（议会）选举，始终坚持一个国家方案（即在巴勒斯坦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建立一个国家和平共处），强调以色列在建国过程中由于忽视当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利益而导致了旷日持久的中东动荡局势，甚至指出锡安主义比伊斯兰激进组织更危险，呼吁全世界对以色列的经济、政治，包括学术界进行抵制。他相信对学术界的抵制是正当合理的，因为以色列的占领是一个不断强化的过程，从而使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状况一天比一天糟糕，大学教师协会要么选择袖手旁观，无所事事，要么成为类似南非反对白人至上主义政权的反种族隔离运动的以色列历史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认为：“选择后者，将推动我们沿着唯一可行和非暴力道路向前，从迫在眉睫的大灾难中拯救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

佩普的历史著作和社会行动遭到了以色列主流历史学家、甚至“新历史学家”学派部分历史学家的批判，遭到了以色列右翼的不断攻击。历史学界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认为佩普的著作为了突出和强化自己同情巴勒斯坦人的论点而不惜虚构史实，以色列社会对他的攻击则认为他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了巨大损害。这种攻击在2000年9月巴以冲突重新加剧的背景下显得尤为激烈。以色列克奈塞特议员多次对他加以谴责，教育部长呼吁海法大学将其解雇，他甚至还受到一些死亡威胁。

2007年，佩普在以色列海法大学校长，著名心理学家阿哈龙·本-茨维要求下主动提出了辞职。虽然本-茨维校长强

* Ilan Pappé, “Back the Boycott”, *The Guardian*, 24 May 2005.

调，佩普不应遭到孤立，因为这将有损于学术自由，但他还是希望佩普能自动离开。就在同一年，佩普创立了一年一度的以色列《回归法》会议，要求给予1948年被驱逐的巴勒斯坦难民以无条件的回归权。

离开海法大学，佩普来到英国埃塞克特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从事20世纪民族政治研究。在接受卡塔尔一家报纸采访时，他谈了自己决定离开以色列的考虑，因为他发现由于其观点和信念不受欢迎，在那里越来越困难。“我在我的大学遭到抵制，校方一直试图赶我走。我每天受到威胁。我不仅被视为对以色列社会的威胁，而且我的人民认为我是个精神病人，我的观点文不对题。许多以色列人甚至相信我是为阿拉伯人工作的雇佣军。”*

二

以色列历史编纂中的“新历史学家”学派的出现与后锡安主义思潮的形成密切相关。

1973年赎罪日战争后，以色列国内一些民众，特别是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更加理性地重新审视和反思阿以冲突问题，特别是积极寻找更加合理和可行的与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和平共处的途径。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冷战后世界格局和中东政局发生巨大变化，以色列内部政治经济结构出现新的变动，特别是奥斯陆和平进程的启动，这股反思的社会思潮在以色列越来越强烈，最后汇聚标示为“后锡安主义”

* Mohammed Iqbal, "Academic slams Israel for land grab", *The Peninsula On-line: Qatar's leading English Daily*, 29 March 2007.

(Post-Zionism)。

其实，后锡安主义是一个交集着不同认知和立场的政治文化术语，总体上并没有形成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一些观点和主张也还没有最终定型，但其共同点是对锡安主义核心信念的批判。在一批以色列人和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特别是其中的一些知识精英看来，锡安主义已完成了在1948年建立现代以色列国的意识形态使命，因此其意识形态功能也应该就此结束，以色列应该形成一种公民身份，形成一种旨在适应自由民主普遍价值的制度框架，任何民族在实质上及制度上不能凌驾于其他少数民族之上。他们提出了许多有关锡安主义和以色列国的问题。如以色列国确实是犹太民族安全住所吗？从历史的角度看，世界上有没有其他地方能让犹太人生活得更好一些（例如北美）？一个兼具犹太性和民主性的以色列国是否可行？以色列是否应该成为所有公民的国家？是否以巴冲突完全是一场非黑即白的冲突？以色列是否以最大的努力去争取和平？阿拉伯方面是否单独承担对冲突持续的责任？从而对以色列国家的现存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并坚信以色列必须在民主性或犹太性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必须把以色列变成所有居民的国家而不是以牺牲其他族群来强化犹太单一族群的认同。需要指出的是，“后锡安主义”这个词也被右翼犹太人使用，按照对奥斯陆协定的立场来指称以色列左翼政治。

后锡安主义思潮的出现，在以色列掀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传统锡安主义和极右翼的新锡安主义的谴责、抨击和攻讦。他们认为后锡安主义是一种“迦南主义”或“泛闪族主义”运动，越轨偏差，严重地超越了锡安主义界限。特别是后锡安主义将锡安主义运动视为一种殖民计划而非一场民族主义运动，

这对以色列国作为犹太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及存在合理性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并削弱了犹太民族精神。他们还抨击后锡安主义有意歪曲历史去迎合反锡安主义思潮，有批评者就将后锡安主义者等同于旧的反锡安主义者。^{*} 还有一些反对者不同意后锡安主义关于以色列“和平意愿”的增长取决于内部因素的判断，强调和平进程是外力强加的，犹太人仍然要以对所占领土的“以色列化”为己任。

在后锡安主义思潮中出现的“新历史学家”史学学派既从后锡安主义那里获得了灵感，并汲取了动力，又通过对大量解密文件和档案的深层研究所提出一系列批评性观点，对后锡安主义思潮提供了学术支撑。需要指出的是，后现代主义对“新历史学家”学派的产生也有一定的影响，推动他们去努力从当今阿以冲突的现实文本去解读 1948 年战争及其后果，并解构和重构那段历史。

总的来说，“新历史学家”是一批对以色列历史，特别是以色列建国、巴勒斯坦人逃离和阿拉伯国家和平意愿的传统假说提出实证挑战的历史学家。他们认为占据主流地位的旧历史学家无法将实证主义与意识形态统一起来，为了意识形态的缘故对史料进行削足适履，从而忽视了方法论和理论问题，同时将研究的重心始终放在社会精英身上，从而忽视了草根民众。如本尼·莫里斯就指出：“旧史学家们作为成年人参与了 1948 年史诗般光荣的犹太国家的重生。他们无法将自己的生命与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分离，因此也就无法客观公正地对待他们写入史书的那些事实和进程。旧史学家们的写作大都依靠访谈和回

* Shlomo Avineri, "Post-Zionism doesn't exist", *Haaretz*, July 08, 2007.

忆录，最多使用了一些有选择的文献，其中许多被删剪了。”*

虽然以色列没有正式的所谓官方史学，新历史学家也不是一个观点同一的学术群体。如在如何看待所谓的“D计划”时，本尼·莫里斯等认为这是为了让新生的犹太国家免遭入侵的权宜之计；而艾兰·佩普等则将其视为企图占领更多的巴勒斯坦土地，驱逐更多的巴勒斯坦人的预谋。但新历史学家通过大量新发掘和解密的政府文件、档案（主要是以色列的，阿拉伯方面的很难获得）和其他相关资料，对诸如锡安主义运动，以色列国家的建立、性质和未来发展趋向，阿以冲突及和平的可能性，特别是对以色列巴勒斯坦人的权益等问题进行了批评性研究，提出了一些修正的史学阐释，力图还历史以真实。此外，以色列对国家历史的理解从70年代起也有所改变，其中的部分新观点也纳入了“新历史学家”学派的视野。

“新历史学家”与以色列主流历史编纂的差异，根据艾米·斯拉姆的归纳，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主流观点认为英国试图阻止犹太国的建立，而“新历史学家”则表示英国试图阻止的是巴勒斯坦国的建立；第二，主流观点认为是巴勒斯坦人自愿逃离家乡，而“新历史学家”认为难民是被赶走或被驱逐的；第三，主流观点认为当时巴勒斯坦地区的权力平衡有利于阿拉伯人，而“新历史学家”则指出，以色列无论在人力还是武器方面都占有优势；第四，主流观点认为，阿拉伯人有一个摧毁以色列的协作计划，而“新历史学家”则强调，阿拉伯世界是分裂的，没有统一的计划；第五，主流观点认为，阿拉伯人的不妥协阻碍了和平的实现，而“新历史学

* Benny Morris ed., *Making Israel*, Michigan, 2008, pp.14—15.

家”则认为以色列对和平困境应负主要责任。*

“新历史学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1948年战争前后，特别关注巴勒斯坦人的命运。他们的著作动摇了传统主流史学关于1948年战争前夕巴勒斯坦犹太社团处于灭绝危险的观点，指出当时碎片化的阿拉伯世界无法支持巴勒斯坦准武装力量赢得后委任时期的巴勒斯坦地区，1948年战争爆发时，巴勒斯坦准武装力量的人数、训练和作战能力都低于以色列部队。他们特别指出，犹太人能够在战争中获胜的原因是犹太代办处与外约旦哈希姆王朝达成了默契，作为承诺不进攻犹太国的回报，外约旦不发一枪地占据了西岸地区。此外，总体说来，锡安主义者成功地说服了大部分国际舆论，将锡安主义事业与大屠杀联系在了一起。“新历史学家”对1948年战争期间巴勒斯坦人自愿出走的神话和有关战后和平谈判问题也提出了挑战，认为许多巴勒斯坦人是被有计划地驱逐的，战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有诚意进行和谈，但以色列不愿意妥协，甚至放弃了和平的机会。

“新历史学家”的这些观点受到了来自以色列传统主流历史学家和阿拉伯或亲阿拉伯学者的批判。前者指责他们编造了锡安主义者的不当行为，而后者则指责他们粉饰锡安主义者的罪行。对“新历史学家”提出的最严肃的指责是他们忽视了阿拉伯方面的史料来源，使用了很少的阿拉伯史料，而且大多数参考引用的还是阿拉伯史料的英文译本。“新历史学家”与传统的主流历史学家和阿拉伯或亲阿拉伯历史学家为此进行了多

* Miron Rapaport, “No Peaceful Solution”, *Ha'aretz Friday Supplement*, November 08, 2005.

场大论战。一些颇具知名度和拥有极高学术地位，并一直坚持远离“非学术问题”的主流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被卷入大论战中。这些知名专家教授虽不否认后锡安主义者所披露的“事实”与“发现”，但却质疑后锡安主义学者的“专业性”，攻击其研究理论与思想背景的“缺陷”。* 其中，本尼·莫里斯和艾米·斯拉姆与萨巴塔·特夫特（Shabtai Teveth）** 围绕其撰写的《大卫·本-古里安传》进行了争论；在《巴勒斯坦研究杂志》1991年秋季第1号上，本尼·莫里斯与诺曼·芬克尔斯坦（Norman Finkelstein）及努尔·马沙拉（Nur Masalha）*** 展开辩论，后者指责本尼·莫里斯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档案资料的同时，构建了相对原来一些史著来说具有“中立性”的新神话，而他所举的证据不能支持他温和的结论，即阿拉伯难民问题产生于战争而非设计，而其证据则显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遭到了系统的和有预谋的驱逐。在回应中，本尼·莫里斯指责批评者陈旧的偏见和歧视，重申了他对阿拉伯人逃离的多方面解释的支持；本尼·莫里斯和艾米·斯拉姆与埃夫拉伊姆·卡什（Efraim Karsh）**** 在《中东季刊》上也展开了争论，后者在1996年6月号上刊文，声称“新历史学家”系统

* 王铁铮：《后犹太复国主义评析》，《西亚非洲》2006年第2期，第26页。

** 萨巴塔·特夫特系以色列著名记者和本-古里安的传记作者。

*** 诺曼·芬克尔斯坦系美国犹太学者、德国纳粹集中营犹太幸存者的后代。他提出“种族大屠杀产业”（Holocaust Industry）这一概念，即通过无穷无尽地反复渲染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大屠杀，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的生存权之外，从而制止世人以对以色列压迫阿拉伯人劣行的任何批评。为此，美国德保罗大学2007年拒绝授予他终身教职，迫使他黯然退出学术界。努尔·马沙拉系英国萨里大学阿拉伯裔宗教和政治学教授。

**** 埃夫拉伊姆·卡什系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犹太裔中东和地中海研究教授。

地扭曲档案证据来按照他们自己制造的形象编造以色列的历史。艾米·斯拉姆则在同年9月号上为“新历史学家”作整体无罪辩护，并对锡安主义者与哈希姆王朝在1948年战争前的勾结做了进一步阐述。本尼·莫里斯刊文表示不值得回应，指责埃夫拉伊姆·卡什的文章是“曲解、半真半假和十足谎言的大杂烩”。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相关争论甚至还越出了学术界。1998年，海法大学学生泰迪·卡茨（Teddy Katz）在硕士论文中声称根据调查采访，以色列国防军第三旅在1948年战争期间在阿拉伯村庄坦图拉犯下了大屠杀罪行。为此，该旅的老兵起诉卡茨诽谤。在法庭听证时，卡茨表示要发表一份声明撤回自己的文章。后来他又表示不再撤回，向最高法院提起申诉，但最高法院拒绝干预。同时，海法大学宣称发现其论文有严重问题，包括文中的引用与卡茨的访谈记录不符，决定暂缓授予学位并要求他重新提交论文。由于艾兰·佩普等历史学家支持对坦图拉大屠杀的指控，因此这一问题迄今仍然是争论焦点之一。2001年，以色列教育部长利莫尔·利夫纳特认为以色列中学里使用的九年级历史教科书《变化的世界》具有后锡安主义性质，便断然发出禁令，并责成各学校将所有该书的副本都用碎纸机销毁。^{*}

“新历史学家”学派虽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对阿拉伯方面的史料很少进行挖掘（当然这有阿拉伯方面资料开放不足的原因），有些观点过于激进，有矫枉过正之嫌，同时对历史审视与反思的宽度不够，过于集中于1948年战争及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对以色列历史的其他方面涉及不多，但是，

* Limor Livnat, “A World of Falsehood”, *Jerusalem Post*, 19 March, 2001, p.8.

他们毕竟结合最新解密的以色列政府和英国政府文件和档案，对巴勒斯坦/以色列历史中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批评性研究，这不仅打破了以色列学术界的长期禁忌，扩展了以色列历史的讨论话题和公共话语，对以色列犹太社会的“话语霸权”产生了冲击与挑战，而且激发了以色列人对以色列官方的“历史即记忆”和有关历史与现状的主流历史编纂著作真实性和客观性的怀疑与思考，从而必将对以色列未来国家的发展，特别是巴以关系的重新解读和理解产生积极的影响。当然，由于犹太正统派在以色列主流社会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新历史学家”的历史叙述与阿拉伯或亲阿拉伯的历史叙述之间仍然存在距离，因此，“新历史学家”学派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会处于边缘地位和尴尬处境，如著名东方主义学者萨伊德所言，充满“非常严重的，近乎精神分裂症的矛盾”。*

三

艾兰·佩普的《现代巴勒斯坦史》200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再版。再版增加了第八章《后锡安主义的繁荣时代》和第九章《自杀之路：奥斯陆协议寿终正寝与毁灭之路》，并将新后记《后阿拉法特及新沙龙时代》代替了初版后记《后奥斯陆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作为“新历史学家”学派的代表作，艾兰·佩普在此书的编纂中首先试图从叙述结构上加以突破，一改以往巴勒斯坦史存在的单一民族叙事主导倾向，正如本书的副标题所言，写出一块土地上两个民族共同交往发展形成的历史，通过对这

* Ephraim Nimni, *The Challenge of Post-Zionism*, London, 2003, p.8.

段历史“双重民族主义化”，甚至“去民族主义化”来放松民族主义对历史编纂的钳制。他在导论中写道：“批判性地运用现代性概念，就有可能不带歧视地解构两种叙事，……需要应对、甚至要推倒的障碍正是深深植根于多数民众心中的两种截然不同版本的国家历史。目前存在着彼此对立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族历史编纂学，在双方不同的教科书中对自己国家的历史自然有更好的叙述。现在这两种历史观出现在同一本书里，有时就会因其自负、种族中心论和精英论调受到排斥与批评，有时在民族史诗篇章得到尊重的同时，其中的荒诞也会遭到奚落。”*

在以往的阿以双方有关这段历史的叙述中，绝大部分是以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在这块土地上开始委任统治作为将这一地区历史分流的起点，并划分成巴勒斯坦人和锡安主义者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至于1948年之后的历史，除了在阿以冲突的特定章节里把这两个民族历史当作同一主题来进行论述外，同时叙述这一土地上两个民族平行发展历史的书籍屈指可数。这种单一民族主导的叙事模式不仅是一种学术上的缺失，更多地受到了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和约束，这里存在着民族主义与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历史学发展之间的纠缠与叠覆。双方的民族主义史学著作都假定这片土地的历史等同于其民族的历史，他们对土地和民族并不作区分，土地和民族同为一体并在同一历史中具有同一本质。正如佩普所指出的：“民族叙事隐匿之手书写了巴勒斯坦/以色列土地的历史。……由于以色列史学家与西方人有着更密切的认同感，对

* 参见《现代巴勒斯坦史》中文版边码2。